

最新教师政治态度 教师政治态度自我鉴定 (汇总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教师政治态度篇一

一学年来，本人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自觉遵守《教师法》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积极参加各项教研活动和课改培训，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自觉陶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作风正派，廉洁从教，为人师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我热爱学校，关心学生，服从学校工作安排，与同事团结协作，工作尽心尽责，态度端正，努力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一学年，我担任初三(7)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在教育教学中，能认真学习领会课改精神，努力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同时，做好教学常规工作，认真备课，课后及时批改学生的作业，注重抓课堂效率，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合作意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关爱后进生，从情感上走近他们的内心，培养他们的自信，引导他们的兴趣，使得他们的在学业成绩和行为习惯方面都有所进步。

在做好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全心全意为学校、为教职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一年来我负责学校办公室工作兼任党支部委员，在书记校长的领导下，组织做好教职工的职称评

聘、年度年终考评、转正定级、奖惩、调动、辞职、退休等事务性工作，组织召开学校行政会、教职工例会，并做好会议记录。负责文件的收发及管理，督促文件的传阅、学习等。负责学校文书档案的管理和校务公开工作，负责起草学校的工作计划与总结，在个人职责范围重视学校德育工作，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

此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关心国家时事，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取得一些成绩。面对激烈的竞争和教育的不断改革，我将继续努力，积极进取，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为山区的教育事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看过教师政治态度自我鉴定的人还看了：

4. 2016教师转正定级自我鉴定

5. 教师转正个人鉴定

教师政治态度篇二

思想积极进步，政治觉悟较高，始终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敢于同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能够辩证、理性地看待事物和问题，大事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

教师政治态度篇三

转眼间，我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毕业之即，对自己几年来的学习和生活作一个总结和鉴定，政治思想品德自我鉴定。

在思想品德上，本人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积极参加学校及系里组织的各项活动，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树立了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并有坚定的政治方向，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在学习上，我热爱自己的专业。除了在专业知识方面精益求精外，我还利用课余时间阅览各类书籍，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和背景知识。

在生活上，我诚实守信，待人友好，乐于助人，一直以来与同学相处融洽。

在工作上，责任心强，具有良好的组织交际能力，和同学团结友爱，注重配合其他学生干部完成各项工作，思想品德鉴定《政治思想品德自我鉴定》。

这几年年的大学生活，使自己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工作能力等方面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即将告别美好大学生活、踏上社会征途的时候，我将以饱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高度的责任感去迎接新的挑战，攀登新的高峰。

一、思想道德素质方面

在思想品德上，本人有良好道德修养，并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拥护*****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爱护公共财产，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并以务实求真的精神热心参予学校的公益宣传和爱国主义活动。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以品德至上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奉行严于律己的信条，并切实的遵行它。

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

学习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凭着对个人目标和知识的强烈追求，刻苦钻研，勤奋好学，态度端正，目标明确，基本上牢固的掌握了一些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中，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动手能力、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力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同时，还注意各方面知识的扩展，广泛的涉猎其他学科的知识，从而提高了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为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而不懈奋斗。

三、身体、心理素质方面

在生活上，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充实而有条理，有严谨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生活作风，为人热情大方，诚实守信，乐于助人，拥有自己的良好出事原则，能与同学们和睦相处；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从而不断的丰富自己的阅历。在心理方面，我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塑造健康人格，克服各种心理障碍，以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教师政治态度篇四

本学期本人担任高一年级(3、4)两个班级的政治学科教学工作。一学期以来，本人自始至终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勤恳、坚持不懈的精神完成本学期的教学和教研工作。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为使今后的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现对本学期教学工作作出总结，希望能发扬优点，克服不足，总结检验教训，继往开来，以促进教训工作更上一层楼。

一、认真组织教学工作，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由于担任的是基础年级的教学，需要为以后的教学打好基础，在本学期本人认真把课备好，不但备教材备教法而且备学生。根据高一的实际，设计课的类型，拟定采用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过程的程序及时间安排都作了详细的记录，认真写好每一课教案，力争做到每一课都做到“有备而来”，每堂课

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并根据教学的需要，采用多种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的时效性，并且在课后及时对该课作出总结。

二、在教学措施上，积极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增强教学的时效性。

本学期本人在教学措施上力图创新，以适应教育教学的需要。本学期在教学上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教学，以提高学生的上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在课堂上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交流，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作用，让学生学得容易，学得轻松，学得愉快；注意精讲精练，在课堂上老师讲得尽量少，学生动口动手动脑尽量多；同时在每一堂课上都充分考虑每一个层次的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能力，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

三、虚心学习，提高自己教学基本功。

虚心请教其他老师。在教学上，虚心请教其他老师，有疑必问。在各个章节的学习上都积极征求其他老师的意见，学习他们的方法，同时，多听老师的课，做到边听边讲，学习别人的优点，克服自己的不足，并常常邀请其他老师来听课，征求他们的意见，改进工作，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

四、认真做好教学常规工作。

认真批改作业，布置作业做到精读精练。有针对性，有层次性。同时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及时、认真，分析并记录学生的作业情况，将他们在作业过程出现的问题作出分类总结，进行透切的评讲，并针对有关情况及时改进教学方法，做到有的放矢。

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

1、在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尤其是新课程改革后的政治教学模式，还需要在实践中在进行改进，同时注意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2、在教研工作中，还需要提高教研的水平和方式，尤其是集体备课方面还需要再推进，本学期做的不够好。

3、难以做到因人而教。对于上课，一部分成绩好的的同学，觉得上课效率不高，对于成绩较差的同学，觉得内容深且多，没有把不同层次能力的学生很好的协调起来。

总之，本学期本人自认为还是比较努力工作的，尽管有一些遗憾，但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自己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教学水平，相信，有耕耘总会有收获。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搜索文档

教师政治态度篇五

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要

分析、比较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探讨诸子学特点和思想传统，可以首先从先秦诸子学派对王权的不同政治态度讲起。

一、先秦士人的政治态度类型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东周以来，原本属于贵族等级的“士”，到了春秋战国因为逐渐失去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能在民间社会创办私学，从事知识生产、文化传播，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教育下移，从而导致诸子学兴起。

毫无疑问，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丰富多彩的诸子学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建构了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华轴心文明。为什么诸子学能够创造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现代学者均高度赞赏这一个时期思想文化的创造者——士。士是中国所特有的一个社会阶层。在西周，士原本是指贵族阶层。西周社会的贵族阶层有五部分构成，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士”是西周贵族社会中最低的等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原本是贵族阶层的士因失去政治特权而成为拥有文化知识的平民；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平民因获得文化知识而成为士。总之，“士”是那些没有政治经济特权而拥有西周贵族才有的文化知识的人。春秋战国时期西周封建制解体，出现许多凭借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而称霸一方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君需要一批帮助他们开拓霸业、治理国家的官僚群体。显然，那些具有争霸能力的诸侯逐渐意识到原来那种血缘封建制的严重局限，纷纷形成一种养士、用士的风气。春秋战国时候的“士”，往往是拥有文化知识、治国才能的读书人，他们通过拥有的知识才能被选入到官僚体系，成为所谓的“士大夫”。

战国时期诸子的社会身份大多都是“士”，但是他们创造的知识、思想却是丰富多彩、千差万别的，并且形成诸子百家的不同学派。诸子百家同是出身于士，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思想差异？这与士所拥有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有关。

本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士”的社会政治身份就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一方面，他们可能与诸侯君主保持密切的政治联系。无论最初是作为贵族阶层成员流落民间社会的“士”，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新产生的“士”，他们均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政治力量，是各诸侯霸主“养”和“用”的对象，所以他们可能成为诸侯统治集团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与现实政治、君主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由于士大多已经失去原来的贵族身份，他们或者已经成为相对独立自由的个体，与君主政体并无必然联系；或者游走、归属于不同的诸侯国家、不同的君主，而并不属于某一个固定的政治集团。

“士”的身份体现出来的多元化特点，使得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具体而言，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如果我们要将诸子百家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依附型、疏离型、合作型。

所谓依附型，指的是士人在参与政治时往往将投靠君主、依附王权作为根本目的，愿意放弃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自觉成为王权政治的附庸。这一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许多已经由“士”转变为“大夫”，有的甚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他们心甘情愿成为王权政治的组成部分，并以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入的政治思考服务君主。这种依附型的士人群体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王权政治的建立和稳定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条件，士人参与政治也必须以维护王权为根本目的。所以，他们认可的国家治理就是君主的独裁政治，士人参与政治不是要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是必须知道自己只是君主权力的工具。这一种依附型士人群体所提出的政治思想都是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由于他们是在王权之外的士人的政治思考，故而对政治的真相、权力的实质有着更为深刻的体认。他们显然是一批自觉成为王权附庸的士人群体。

所谓疏离型，指的是那些因不愿成为王权政治附庸而采取一种疏离王权政治态度的士人群体。他们强调个体存在、精神自由的价值高于一切，坚持自己作为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将国家、君主等权力体系看作是独立性个体存在的对立物，希望自己不与王权政治有密切联系。为了保障自己的人生安全和精神自由，他们主张疏离王权政治，决不愿意成为王权的附庸。这一种疏离型的士人群体，尽管可能有满腹经纶，是那些求贤若渴的诸侯君王“养”和“用”的对象，但他们并不愿意进入到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系统中。所以，疏离型士人群体大多并不关心富国强兵、国家治理的政治思考，而是更为关心作为个体存在的士人的身心快乐、精神自由。他们往往对人的个体价值、生命意义有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不为物累、全性保真、逍遥等人生哲学。他们是一批与疏离王权、与政治保持距离的士人群体。

所谓合作型，指的是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士人群体的极端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中，选择、追求一条中庸的道路。一方面，他们愿意成为王权政治的臣僚，主动参与到王权政治体系，竭力维护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将维护、巩固现有政治秩序作为参与政治的初步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坚持士人的独立性立场与主体性思想，以天下为公、天下有道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强调士人的个体人格和精神自由，决不成为王权的附庸。主张这一条中庸道路的士人群体，对现实政治体系的王权，主张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他们往往既有依附型士人群体的参与政治的热情，又对王权保持距离并始终坚持自己的价值理想；既有疏离型士人群体对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追求，又不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政治热情。他们与现实的君主政治保持一种合作态度，以最大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群体与诸侯王权分别有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三种类型的关系。我们认为，先秦时期的诸子思想均可以划分到上述的不同类型之中。在诸子百家中，其政治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是法家、道家、儒家，他们的政治思想非

常典型地体现为上述的依附、疏离、合作三种类型。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目标，强调士人必须以君王的权势为重心而推动富国强兵，故而他们自愿做“人主之爪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道家思想（主要是杨朱学派、庄子学派）以士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快乐、精神自由为目标，主张不受国君的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道德法律的主宰，是一种典型的疏离型的政治态度。而儒家思想主张对现实王权采取一种合作的态度，既有参与经世、与君主合作的政治愿望，又强调保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他们希望加强与诸侯王权的合作，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儒家士人的独立思想，往往通过与君主的合作而表现出来，故而体现出与道家、法家不同的政治态度。他们在追求与现实政治系统合作的过程中，倡导和坚持一种儒家士大夫精神的传统：一方面，他们表现出一种独立性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敢于对现实君主政治的专横、暴力进行严厉的批判；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表现出实用理性主义态度，希望进入到政治体系而成为君王的臣僚，实现经世致用的政治追求。

当然，上述三种政治态度类型其实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后来历史中的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并不是那样单一的，他们总是学习、吸收诸子学派的不同思想学说，这往往使得士大夫个体形成依附、疏离、合作等多样化的政治态度。由于历史的不断演变，各个诸子学派也在相互吸收对方的思想学说，秦汉以后就不再有了纯粹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法家学派，各个诸子学派在吸收其他不同思想学说。这时，作为群体的诸子学派和作为个体的士大夫，也往往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体现出多样化的政治态度。

二、依附王权的法家

法家是一个由众多士人组成的思想家、学者群体，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其中，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术、势三

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此重点谈谈韩非的政治思想，以探讨法家依附王权的政治思想。

在先秦诸子中，法家对王权表现出一种典型的依附型政治态度。这一种政治态度决定了法家思想是以君主的“势治”为根本。法家异常突出地强调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同时主张在政治体系的君、臣、民三者的关系中，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王的权势。

这首先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有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法家作为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即都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担任过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别重任，通过君权的强制权力而推动变法，所以他们能够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认同。譬如，李悝曾经担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国推行变法，著《法经》；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国的变法，获得封侯；慎到曾经担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担任韩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韩非子曾经担任韩国重臣，后来又深得秦始皇的厚爱。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权，放弃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他们个人的政治经历有关，他们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的共同体。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还与法家的一个普遍性政治认知与政治信念有关。一般来说，法家人物比较普遍地强调君主“势治”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他们有一个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权和权势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韩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国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让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君王必须大权独揽。韩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谓的贤能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之所以推崇权势政治，就在于他坚信国家治理必须依赖一个强势的君主控制的权力体系。他继承和发扬了慎到的重势的思想，特别指出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贤能政治与权势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

证明君主政治是依赖君主的权势而实现国家治理，寄希望于贤能君主或将其归结为贤能治理是矛盾的。他认为：“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故曰：势治则不可乱，而势乱则不可治。”（《韩非子·势难》）他所认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子·八经》）所以，韩非子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势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韩非子强调“势治”的必然性，其政治思想也就特别关注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有关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成为其政治思想体系重要内容。

首先，韩非子特别探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儒家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仁爱忠义的道德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政治合作关系，而是直截了当地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争斗、彼此算计的政治对立关系。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爱臣》）韩非子冷静地分析了君、臣之间对立和争斗的严酷事实。尽管韩非子本人是为人臣者，但他并没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体立场，而是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场，处处以维护君主的权力、利益着想，主张在君、臣之间争斗中，君主应该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绝不允许臣子争夺自己控制的权力。他说：“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得，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韩非子·主道》）所以，他反复强调：“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韩非子·人主》）他处处站在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上，认为君主一旦发现臣下有结党擅权的举动时，就应该严加提防、严厉打击。《韩非子》的大量篇幅均是告诫君

主如何控制权力、抑制臣下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出韩非子依附王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其次，韩非子探讨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继承了三代先王的民本思想，倡导爱民、富民，反对苛政严刑。但是，韩非子反对儒家的民本政治，坚持君本的立场。他仍然是从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爱民富民的国家政策，坚持苛政严刑以维护君权。他针对爱民有益于国家治理的说法提出质疑：“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韩非子·五蠹》）既然爱民不能够有帮助君主治国，而寡恩严刑才能够有助于君主的势治，那么他就坚决反对爱民。同样，他反对富民足民，认为老百姓会永远不知足，故而“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标不是富民，而是通过苛政严刑的治理，实现“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韩非子·六反》）的“帝王之治”。

韩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关系上，特别突出地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那就是拥有“势”的君王必须掌握“法”“术”这两个关键的手段。《韩非子·难三》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他认为拥有“势”的君王，还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二者均是“帝王之具”。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由此可见，虽然法家提出了法、术、势的系统学说，并且被称之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势”，“法”与“术”均是拥有“势”的君王维护王权、治理国家的手段。

正由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权势为目的、核心的，故而其政治态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参与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他在《说难》中告诉一切臣子应该如何与君王相处。正如王先谦

先生解释《说难》的题意所说：“夫说者有顺逆之机，顺以招福，逆以招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韩非子·说难》）韩非子既然肯定“以势治天下”的必然性，就必须告诫那些进入君主政治权力体系的士大夫，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势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意旨，成为一切进入政治系统的士大夫必须遵循的政治法则。儒家士大夫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而韩非子的《说难》则强调“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十分生动地体现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态度。

三、疏离王权的道家

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各种治国安邦、统一天下的社会政治思想，同时也产生了以个体存在为中心的思想学说，最有代表性的是杨朱、庄子的学说。杨朱、庄子均轻视君臣父子的名教秩序，轻视治国安邦的政治功利，而将个体的生命存在、精神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故而在思想观念上一脉相承，均属于道家学派。道家是一个由众多不同政治态度、价值取向的思想家们构成的大学派，其中既有以自然之道为帝王南面之术的黄老道家，又有以自然之道为个人身心快乐、精神自由的杨朱、庄子派道家。这里重点探讨那些疏离王权型政治态度的道家，即杨朱、庄子派的政治态度。

杨朱属于道家学派，提出的思想主张和庄子有相通的地方，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的思想，就和庄子有内在联系。杨朱的政治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为了个体存在的价值和自由，他坚持一种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杨朱强调个体自我的最高价值，故而与其他诸子以君王、国家、天下为最高目标的政治态度完全不同，他坚持的“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均鲜明地体现出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其他学派总是标榜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目标，而杨朱则旗帜鲜明地强调“为我”“贵己”，希望士人们建立起以“为我”为中心价值观，以利于士人在

社会动荡、诸侯争霸的战乱中的个体人生安全，坚持将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置于最高地位。史籍记载杨朱的种种言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韩非子·显学》）战国初年，杨朱的言行在当时影响很大，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之说，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在宗法政治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时自我意识的觉悟与个体存在意义的高扬。

杨朱坚持“不拔一毛”“不以物累形”的个体生命自保的价值观念，庄子则不仅要求个体生命的自保，而且希望个体生命的自由，提出一系列如何达到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司马迁为庄子写列传，生动具体记载了特别体现庄子政治态度的生平事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

杨朱、庄子均彰显个体存在的意义。杨朱主要倡导“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以求个体生命的自保。庄子则连千金之重利、卿相之尊位也拒绝，将个体存在的意义从生命形体的保护发展为精神自由的追求，进一步表达了他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

由于庄子坚持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所以与其他诸子学派不一样，对君权表示极度的鄙视，并严厉地批判君主政治的非道德性。庄子的理想社会是人们普遍遵循自然之道的“至德之世”，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一切东西，包括人们最为追求的科技、道德和国家政治，均是违背自然之道的。文明社会普

遍推崇帝王、君主、圣王。但在庄子眼里，这些帝王、君主无非是一些窃国大盗。在《肱篋》篇中，庄子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些尊贵的诸侯国君的权力来源于哪里？庄子认为他们多是依靠偷盗、抢劫而获得，他们对国家的统治权力并不具有合法性。庄子指出，只有那一些并不希望统治人们、放弃统治权力的“天德”之士，才具有国家统治权力的合法性，而这一种人恰恰是生活在没有君主统治的“至德之世”。他说：“君原于德而成千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庄子·天地》）他对“无为之君”的推崇，其实是否定了君主的政治权力。既然现实政治中的国君都是一些窃国大盗，一切高明之士就应该疏离王权、放弃卿相之位的名利追求。

庄子疏离王权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身”“全生”的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庄子特别喜欢讲“保身”“全生”。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而且，庄子讲的“保身”“全生”总是兼及形、神两个方面：“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庄子·天地》）“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庄子·在宥》）庄子总是兼顾个体身、心两个方面，以突显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然，庄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既是“保身”“全生”的生命安全考虑，更是因为强调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真正对后来的士大夫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恰恰是他提出的追求精神自由的“逍遥”“游心”“齐物”：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庄子·应帝王》）

庄子向往的逍遥、游心、齐物，其实是一种对摆脱政治权力的强制、社会关系的羁绊，尤其是在精神上摆脱功利欲望的诱惑、名誉地位的向往，达到一种完全无所依赖的“无待”的“逍遥”之境，这是一种完全的精神自由。达到这一种精神境界的人，当然只能是完全疏离王权的道家士人。

四、与王权合作的儒家

与法家依附王权、道家疏离王权的政治态度不同，儒家追求一种与现实王权的合作态度。所以，儒家往往既会执着地向君主权力集团靠拢，希望取得君王的信任，以进入到权力体系中，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活动；又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理想，并不会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一味地取悦于君主，像法家那样完全成为王权的依附。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儒家所谓的“道术”，其实是政治理想主义的“道”和具有政治现实主义的“术”的结合。一方面，儒家是一种独立的士人群体，他们拥有超越现实政治、超越王权治理的政治目标，他们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天下有道”“仁政”。所以，他们的政治思想往往是理想主义的，他们设计了一整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并且用这一套理想化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作为规范政治、约束君主的政治道德准则，也作为衡量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应该说，对于那些急于富国强兵、开拓霸业的诸侯君主来说，儒家这一套道的价值理想、道德标准既无实际用处，又太高远而难以企及，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儒家所谓的“道”。所以，儒家士大夫如果坚持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坚持自己的政治诉求，常常会受到君主的冷落而成为“丧家之犬”，或者和君主权力产生冲突而“以身殉道”。

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一个参与君主政治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必须与现实政治的王权系统密切合作，实现国家治理的政治目标。作为积极参与现实政治、与君王合作的儒家士大夫群体，他们拥有现实政治运作的政治手段，掌握、倡导一

套实用理性的“治术”。儒家士大夫的“治术”不仅包括有关礼治秩序、礼乐教化，还特别提出了富国、爱民、举贤、足兵等一系列富强之治术。后来，儒家的经世之学发展出包括礼乐、兵刑、食货、吏治、兵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治国之术。他们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以完成对政治功利的现实追求。儒家学者一旦成为“大夫”，就会将自己掌握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治术”付诸政治实践，这也是后世出现大量“儒臣”并受到君主欢迎的重要原因。儒家应该是一个有共同价值信仰的士人群体，但是儒学毕竟是一套人世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信仰，当儒学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会成为一个由众多不同社会身份、不同政治诉求、不同思想趋向的人们组合起来的庞大社会群体。因而，儒家士大夫的思想角度十分多元、层面十分多样，儒家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不断演变发展。所以，当我们今天考察儒家士大夫群体、儒学思想体系时，应该特别注意某一个时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与作为两千多年的儒学整体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学者的政治思想与作为体系化的儒学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注意某一个儒家政治思想或命题与儒学全体政治思想的区别和联系。所以，我们应该肯定：孟子是儒家，荀子也是儒家；董仲舒是儒家，王充也是儒家；王安石是儒家，邵雍也是儒家；许衡是儒家，刘因也是儒家；倭仁是儒家，康有为也是儒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都是儒学基本思想、信仰的追随者，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儒家学者又只是儒家部分思想的遵循者、实践者。儒学系统需要这些不同类型、不同旨趣、不同道路的实践者，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儒家思想体系、儒教文明体系的建构，更加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功能，更加全面完成儒教文明的奠定。

事实上，儒家士大夫在具体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下，与君主的合作的政治态度、思想追求表现出很大区别。一方面，同一儒家学派的不同学者，他们的个人经历、思想性格、学术旨趣不同，故而往往可以归类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士人群体之中。譬如，儒家士人选择与国君的合作后，其内部又产生了有很大思想差别的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尽管他们都是与

王权合作的儒家学者，但是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和荀子的政治现实主义就有很大差别。另一方面，同一个具体的儒家士大夫个体，可能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人生阶段的思想观念变化，因在朝和在野的不同人生处境，形成多样化的政治态度。在历史上，那些强调政治现实主义和经世致用的儒家人士，甚至可能在与王权合作的过程中转化为对王权的依附。虽然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以儒家为主体，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却可能体现出依附型士人的转变。那些坚持独立的价值理想和政治诉求的儒家学者，可能在与王权合作失败后转化为对王权的疏离，走人出世的道路而亲近佛、道。

同时，由于儒家对王权的政治态度是合作型的，他们希望与君主政治的这一种政治合作能够取得成功，所以他们努力兼顾“道”与“术”两个方面，即自己独立的价值理想与君主政治的现实治理。与此相关，儒家在学术思想上追求两种不同的学术旨趣和思想目标，故而在后来的学术史上作为整体的儒学又分化出来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传统：一种被称之为“内圣之学”的学术传统，另一种往往被称之为“外王之学”的学术传统。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中国，“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常常融合为一体，但是在实际的学术建构、思想整合的历史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术思潮、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学学派、不同儒家学者，会对“内圣之学”或“外王之学”有不同倾向。当代学者在研究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时，可以通过考察这种学术与思想的基本立场、问题意识、最终目的是“内圣”还是“外王”，从而将其思想特征作“内圣之学”或“外王之学”的分疏。一般来说，“外王之学”的思想目标、学术旨趣在经世治国，故而这一种学说的问题意识均是维护礼治秩序、强化王权治理、追求富国强兵。“内圣之学”的基本立场、问题意识是实现合乎价值理想的道德人格，其最终目标是“成圣成贤”。传统中国的“外王之学”和“内圣之学”之间相互渗透，在政治问题上有许多交叉和合作，但是梳理他们之间的差异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史意义。